

主 编 杨永生
副主编 段应君 王 昱

酒泉宝鉴

馆藏文物精选



甘肃文化出版社

酒泉宝鉴

——馆藏文物精选

主 编 杨永生

副主编 段应君 王 昱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泉宝鉴:馆藏文物精选 / 杨永生主编.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80714-761-9

I. ①酒… II. ①杨… III. ①博物馆—历史文物—酒泉市—图集 IV. ①K872.42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9911 号

酒泉宝鉴——馆藏文物精选

主编 / 杨永生

副主编 / 段应君 王 昱

责任编辑 / 何荣昌

装帧设计 / 汇丰彩印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营 销 / 甘肃省文化出版社发行部(0931) 8454870

印 刷 / 酒泉市汇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0937) 6988881

厂 址 / 酒泉市太阳岛小区 34 号综合楼

开 本 / 800 毫米× 1230 毫米 1/16

字 数 / 277 千

印 张 / 16.25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 1~1000 册

书 号 / 978-7-80714-761-9

定 价 / 160.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璀璨夺目的酒泉瑰宝

酒泉市文化出版局副局长 杨永生
酒泉市文物管理局局长

酒泉是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经济、军事重镇，也是甘肃省文物大市。作为敦煌艺术的诞生地，戈壁绿洲、瀚海沙漠、史前聚落、古郡重镇、丝路古道、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石室文书、流沙坠简等，构成了酒泉绚丽多彩、底蕴深厚、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并以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三山四水百绿洲”是酒泉的地理特征（三山指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阿尔泰山余脉马鬃山；四水指讨赖河、疏勒河、黑河、党河）。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肥沃的绿洲，孕育了酒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明。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人就在酒泉北部马鬃山明水地区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存；20 世纪末，在玉门昌马一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址。由于这些发现缺乏相应的实物资料予以佐证，故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0 世纪 80 年代末，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在肃北县马鬃山明水地区考察时，在下霍勒扎德盖附近一细砂层中发现了三件明显经过人类打制的石器。通过对这三件打制石制品的性质分析，结合当地地层的堆积状况，考古学者初步断定这里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一处文化遗址，距今约 5 万年左右至 1.2 万年。由此证明，酒泉是中国早期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

大约从距今 4000 多年前后，酒泉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特征是磨制石器大量出现，磨制石器的加工更加精细，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制造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同时，原始的农耕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并发展。

新石器时代，酒泉先民主要活动在酒泉盆地（包括今肃州区大部分和金塔县）和敦煌、

瓜州凹地（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及玉门市大部分），人类生存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酒泉的先民们开始使用经过磨制的石器，而且形式多样，用途专一。从目前出土的石器看，许多石器经过钻孔，并安装上木柄，被制作成比较精细的劳动生产工具，这说明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劳动工具制作技术在不断进步，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从出土的部分陶罐及棺木中，发现了粟等植物种子，说明当时酒泉已经有原始农业。在玉门火烧沟等遗址墓葬中，发现大量羊头骨、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等随葬品，证明当时酒泉先民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随着狩猎工具和狩猎方法的进步，捕获的动物增多，开始了有意识的人为驯养，出现了早期的驯养畜牧业。这一时期的陶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孟等陶器，胎薄面光，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说明酒泉一带在当时的文明发展中，制陶业已趋成熟。

夏、商、西周时期，酒泉先民和中原地区一样，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这一时期，酒泉属雍州西界。当时在酒泉境内活动的主要是羌、戎等民族。根据文献记载，他们本来是居住在长江、淮河流域一带的“三苗族”，“五帝”时期尧主政时，从江淮迁移到三危（今敦煌一带），改称“西戎”。西羌族即羌族，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羌族被称为牧羊人，火烧沟文化即是羌文化的一支。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商代的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一带。《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春秋、战国时期，酒泉一带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驻牧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角逐，领地时有变化。《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月氏“旧在张掖、酒泉地”。1957年，在玉门骊马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砂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人们推测是秦汉以前乌孙和月氏在这里活动的遗物。乌孙即“戎”的转音，月氏则为羌族的一支，羌、戎皆是战国以前酒泉境内古老民族。在今敦煌南湖乡古董滩和瓜州双塔水库等地，也发现过石刀、石斧等遗物。

汉初，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匈奴势力的日益强大，匈奴攻破月氏，占领河西地区，并且不断骚扰汉境。刚刚推翻秦帝国建立的汉政权，因结束战争不久，国力尚弱，没有能力与匈奴作战，不得已采取“和亲”政策，暂缓与匈奴的正面矛盾。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逐步强大，国力充实。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两次出征西域，大败匈奴，收复了河西地区。随后，西汉在河西设立酒泉、武威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两郡，设立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从此，酒泉成为河西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天下三分，酒泉归属于魏，仍为酒泉郡，沿用汉制。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亦承延汉制。到东晋十六国时，酒泉先后为前

凉、后凉、前秦、后秦、北凉、西凉割据，仍以酒泉为郡。此时，因中原大乱，战争频繁，河西地处偏僻，从而远离了中原的战火，中原一些豪强大族、名门世家，举家迁徙到酒泉一带，客观上促进了河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人民富庶，甲于内郡”。酒泉成为河西走廊西段的交通要塞和军事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405年，西凉国王李暠将国都由敦煌迁至酒泉，因此，酒泉在历史上曾被美誉为“小西京”。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酒泉置镇。仁寿二年（602年），改酒泉镇为肃州，领福禄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废州置郡，复废郡，福禄县归甘州管辖。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改福禄县为酒泉县，酒泉县始名。唐朝建立后，置州废郡，酒泉又改名为肃州。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日渐衰弱，吐蕃乘机蚕食河西，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肃州陷于吐蕃。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因吐蕃内乱，沙州（今敦煌）人张议潮起义，收复河西肃州、瓜州、沙州、甘州等11州地，唐王朝在河西置归义军，张议潮为节度使。905年，张议潮之孙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亦称“西汉敦煌国”。914年，张承奉死后，曹议金取代张氏，与在河西的回鹘政权友好相处，并向唐、宋政权朝贡，酒泉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稳定。

1036年前后，党项族李元昊（北魏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李姓为唐王朝所赐）率军打败了甘州回鹘，攻占肃州、瓜州和沙州，曹氏政权归降西夏。1038年，李元昊建国大夏，因地处北宋王朝西北，史称西夏。西夏建国后，重视农牧业生产，并采取了积极措施。在西夏统治河西时期，酒泉一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保持着“与中州无殊”的水平。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了漠北诸部族，建立起了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1226年，铁木真南下攻取肃州、甘州等地。1227年7月，西夏王朝为蒙古军队所灭，酒泉归属蒙古人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置肃州路，设总督府。元帝国建立时，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肃州（酒泉）、沙州（敦煌）两州百姓不过万余人，后蒙古人大量拥入河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酒泉、敦煌再度繁荣。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在这时期沿丝绸之路，经酒泉漫游了中国各大城市，并著有《马可·波罗行纪》。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起兵攻破元大都，建号大明。其后，征虏将军冯胜平定河西，置肃州，隶属陕西布政使司。冯胜以肃州地处极边，修筑嘉峪关以控西域门户，弃瓜、沙二州于关外。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置肃州卫，军政合治。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统一中国。清初仍置肃州卫，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改肃州卫为肃州，隶甘州府。1729年，改置肃州为直隶州，隶甘肃行省布政司。

辛亥革命爆发后，酒泉废除了清朝专制时期的总督以及镇、道、府、州等建制，建立了共和体制的省县制，将原来的安肃道划为酒泉、玉门、安西、敦煌、金塔、高台、鼎新7个

县市。

1949年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酒泉既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也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更是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在急剧时代变迁中，各民族不断地大冲撞、大交流和大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酒泉文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和发展了令后人瞩目的史前四坝文化、厚重庞杂的汉简文化、连绵不绝的长城文化、大气磅礴的边塞文化、横跨欧亚的丝路文化、特色鲜明的汉晋文化、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像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向世人讲述着酒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

酒泉一带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有：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包括瓜州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在内的敦煌石窟艺术；以瓜州锁阳城，敦煌玉门关，金塔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为代表的古城遗址；以玉门火烧沟、肃州区西河滩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分布在全市7个县（市、区）的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的以肃州区果园古墓群、瓜州锁阳城古墓群、敦煌佛爷庙—新店台古墓群等为代表的200多处数万座古墓葬；遍布于全市各地的古郡重镇、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生动地展示了酒泉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痕迹，向我们揭示了一座古郡重镇的文明魅力。

被列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古文献重大发现的敦煌遗书、居延汉简（另外两种为殷墟甲骨文、故宫明清档案）都诞生于这片古老的土地。随着这些文明精华的发现和出土，并经后人发掘、整理与研究，逐渐形成了20世纪以来新兴的四大显学——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和档案学。

一、史前文化引人瞩目

酒泉境内已经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有：肃州区西河滩、干骨崖、赵家水磨、下河清遗址；金塔县缸缸洼、火石梁、羊井子湾遗址；玉门市火烧沟、砂锅梁、骗马城遗址；瓜州县鹰窝树等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劳动生产和狩猎工具、日常生活器物等，为研究酒泉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实物资料。

197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距今约3700多年的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先后清理墓葬312座，出土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金、银耳环以及玉器等若干件。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彩陶、石器与金银器、铜器共存。最为突出是大量的彩陶，它们大多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其中不少属于珍品。此外，还有不少鼻饮、发椎及男子戴的耳环等装饰品。这些器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反映了酒泉多民族的历史渊源。

火烧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金属器物的大量使用。火烧沟墓地先后发掘有312座墓葬，出土铜器的就有106座，铜器大部分由分铸而成。火烧沟出土的一件四羊头铜权杖，柄首为分

铸，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分铸铜器。从这些情况看，当时的冶铜专业人员已掌握了采矿、冶炼、制造和铸造成型等生产工艺，冶铜业更趋成熟。火烧沟铜器以模铸为主，有斧、镰、镢、凿、刀、匕首、矛镞、钊管、锤、镜形物等。此外还发现了铸镞的石范。铜箭镞石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铸箭镞石范。镞即箭头，这种兵器在战争中消耗量很大，射出后又不能收回，没有高度发展的青铜铸造业是供应不上的，表明当时火烧沟青铜文化已经处于很高的发展水平。

2003年—200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肃州区西河滩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三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10000多平方米，从客观上了解了我国西北部戈壁沙漠地区远古至中古时期遗址的现状。西河滩遗址是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首次发掘的一处史前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文化遗迹丰富，特色鲜明，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该遗址包含史前时期的河西马厂类型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四坝文化是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和商早期）和西河滩史前遗存的自身因素，其中西河滩自身因素相对为主。

从西河滩遗址中，发掘房屋基址50多座，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半地穴式房址平面皆为长方形，地穴深度在0.25米~0.6米之间，室内地面均经硬化处理。地面式房址平面形式较为复杂，其中有长方形的单室，也有长方形主室附加半圆形或长方形的后室和侧室的多室形式。一座“三室一厅”结构的房屋基址，设计精巧，让人叹为观止。西河滩遗址的房屋基址，不但数量大、类型多样，而且获取信息全面，是文物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突破。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学术界首次提出“烧烤坑”这一名词，发现古代人类的另外一种炊食形式，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发现古代人类生活起居的各种坑窑，如数量大、种类多的储藏坑、祭祀坑、陶窑、墓葬、畜圈等，以及从坑窑中出土的一定数量的陶器和大量的陶器残片、石器、骨器、玉石器等，这些对研究史前文化和汉至魏晋时期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二、彩陶艺术绚烂多姿

甘肃是中国彩陶艺术的故乡。甘肃彩陶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端，终于青铜时代晚期，历经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是中国彩陶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甘肃彩陶文化分属不同文化体系，呈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受地域条件的影响，其东部、中部、西部各有不同的古文化和彩陶，即使在同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有学者依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内涵进行归纳，将甘肃东部、中部、西部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彩陶文化区。酒泉即属于这三个片区中的西部彩陶文化区。

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部，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制约，生存环境较为严酷，故文化发育

比甘肃东部迟缓。因地处荒漠戈壁，条件恶劣，只适宜于半农半牧，彩陶比甘肃东部出现得要晚，且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才告结束。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得知，区域内有明确证据的彩陶文化最早遗存，是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场类型，即后来逐步演变为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在东部地区彩陶文化开始日渐没落之时，这里的彩陶文化却依然繁荣。肃州区西河滩、玉门市火烧沟等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彩陶器物。这些彩陶多以夹砂陶为主，大多黑彩，有一定数量的红彩，盛行紫红色陶衣。彩陶纹饰主要有三角纹、蜥蜴纹、回纹、条带纹、折线纹、网格纹和圆点纹等。

酒泉出土的彩陶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它的某些器型与彩绘图案，既受到马家窑文化马场类型、齐家文化元素的影响，又接近于中亚文化的一些特点。陶器多为夹砂陶，器型多样，以罐、壶为主，四耳盖罐、腹耳壶是其代表性器物，如火烧沟出土的手形纹羊头柄方杯（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内彩变体蜥蜴纹豆（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圆点纹鹰形壶（现藏甘肃省博物馆）、人足形彩陶罐（现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四耳带盖罐（现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三角纹双大耳罐（现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肃州区干骨崖出土的夹砂靴形陶罐、舞蹈纹陶罐（现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器物制作细致，形象逼真，表现了远古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高超的智慧和审美能力。玉门火烧沟出土的 20 多个陶埙，部分绘有装饰纹饰，能吹奏 6、1、2、3 四个完全音，说明原始音乐艺术已经兴起。

三、石窟艺术闻名遐迩

1600 多年前，随着佛教的东传和在酒泉境内的传播与兴起，各地信徒开始以敦煌为中心，沿着丝绸之路开凿佛教石窟，传播佛教文化。中亚、印度及欧洲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在传播中不断相互影响和吸收，历经 1600 多年，最终构造出一条石窟艺术长廊，形成境内独具特色的佛教艺术。

酒泉境内自西向东，分布着肃北县五个庙石窟，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瓜州县榆林窟、东千佛洞石窟，玉门市昌马石窟等十余处石窟寺。这些博大精深、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艺术，为敦煌学的形成及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学术史料。

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持续修建达千年之久。存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主要分布在莫高窟南区，有 492 个洞窟（实有 491 窟，其中 485 窟和 486 窟为同窟重号），壁画 45000 平方米，雕塑 2000 多尊。1988 年—1995 年，考古学者对莫高窟北区洞窟作了彻底调查、编号和考古发掘。经调查确认，莫高窟北区共有 248 个洞窟，其中 243 个是在这次发掘中正式编号，5 个为原有编号。南北两区总计 735 个洞窟（实有洞窟 734 个）。

敦煌石窟的内涵包括洞窟、彩塑、壁画、洞窟题记、廊檐、殿堂、佛塔、碑铭、法器、供物（如挂幡、纸帛画之类）、佛经和其他宗教典籍与世俗文献 10 多个部分。其中，作为敦

煌石窟艺术而闻名于世的，主要是洞窟、窟檐及佛塔建筑、彩塑、壁画和纸、帛、幡画。敦煌石窟艺术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帛画艺术、版画艺术、书法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八大类。其中，莫高窟是规模最大、延续时代最长、艺术价值最高、影响和知名度最大的石窟。因此，敦煌学研究界把莫高窟作为敦煌石窟最杰出的代表。因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莫高窟（含西千佛洞）、榆林窟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四、敦煌遗书享誉中外

敦煌遗书是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藏经洞（即第17窟）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古代文书经卷。敦煌遗书的发现，是20世纪古文献研究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目前，敦煌遗书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国内外数十家研究机构和收藏单位，总数在5万件以上。敦煌文书最早为西凉建初二年（406年），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年）。

敦煌遗书多为卷轴式，还有梵筐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等形式。除大量的写本之外，还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插图本等多种版本，在我国乃至世界书籍发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装帧史上都是十分难得的珍贵实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五、简牍文书名重学界

酒泉境内出土的汉简举世瞩目。著名的居延汉简、悬泉置汉简、敦煌汉简、玉门花海汉简和酒泉汉简的出土，声震学界，影响深远。这些汉简总数达5万多枚，占据了国内出土的7.5万多枚汉简的绝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简牍之乡”。由于当地气候特征的因素，这些汉简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仍保存比较好，对于研究汉代酒泉地区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民俗、军事、人文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字数据。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就汉简的价值而言，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自20世纪初期，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烽燧下发掘出789枚汉简后，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历史序幕被揭开。正是这批汉简的发现，一门新兴学科——简牍学随之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考古学者在酒泉境内居延遗址的卅井塞、破城子（甲渠候官）、大湾城、地湾城等20多个地点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先后采获了汉简3万多枚，被称为居延汉简。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敦煌马圈湾多个地区先后发掘出竹木简牍2400多枚。

1990年—1992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瓜州和敦煌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发掘考证，该遗址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先后出土各种器物4万多件。特别是2万多枚汉代简牍和数百片西汉纸张的出土，成为该遗址发掘的亮点。其中汉简有明确

纪年的 1900 余枚，最早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反映了这两百多年前后的有关史实。

酒泉境内出土的这些简牍文书，不仅数量巨大，占据了国内出土汉简的绝大部分，而且内容丰富，形制复杂，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中西交通、中外交流、邮驿制度、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西北边塞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戍卒生活、屯田戍边、水利建设、农业耕植、畜牧养殖、粮食储运管理、官吏设置，以及汉代对边郡酒泉、敦煌的经营和治理，记载得十分详细，成为补史、证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目前，中国有关高校和人文科研院所都有专家学者研究酒泉简牍；在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都有研究酒泉简牍的学者。酒泉简牍中有记载西域 30 多个国家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真实载录了当地人来中原朝贡、通使、和亲、封拜、商贸和求学的情况，是丝绸之路文化交融和中外关系发展的历史凭证。

六、汉晋遗存遍布全境

自汉武帝大败匈奴后，河西地区从此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从元狩二年（前 121 年）开始，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设置，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沿线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重镇。西汉王朝依托当地肥沃富饶的绿洲，开始大规模移民屯田。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酒泉郡逐渐成为一片新兴繁荣的农业区，成为汉朝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经过两汉 400 多年的开拓和经营，酒泉农牧业经济区初步形成，农业与畜牧业并存，手工业与商业互补的经济格局开始发展，保证了汉代边疆地区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

魏晋时期，是酒泉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期，也是画像砖、壁画墓和模印画像砖发展的极盛期。由于酒泉地处偏远的河西走廊地区，较少受到中原战乱的侵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活相对稳定。酒泉一带河流沿线的绿洲地带，灌溉农业相对发达，较为丰沛的祁连山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滋润着肥沃的农耕之地。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延续着古老的文明。酒泉境内遗存数量巨大的汉晋至唐时期的古城池、古墓葬群，独具艺术特色的当属魏晋时期的墓葬画像砖、模印画像砖。画像砖精湛的绘画艺术所表现的丰富生活内容，以及宏大的墓室建筑构制，都表达出墓室主人期望在冥间也要保持生前富裕、悠闲的生活。肃州区丁家闸 5 号壁画墓为十六国时期壁画艺术的代表，在河西地区壁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西沟 1、2、3 号唐墓等出土的模印砖、模印画像砖，将酒泉的砖雕艺术推向新的高峰。画像砖所描绘的情景，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研究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史，还是研究当时酒泉乃至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以及政治、法律、军事、民族、民俗、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画像砖都具有重要价值。画像砖不仅展现了魏晋时期绘画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酒泉境内后来一度辉煌的石窟壁画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边塞长城绵延千年

酒泉是甘肃省长城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境内汉、明长城总长为823.5公里，其中，汉长城742.9公里，明长城80.6公里。明长城主要分布在肃州区和金塔县；汉长城主要分布在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和敦煌市。特别是汉长城，因酒泉一带干旱少雨的荒漠气候，虽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存延续至今。

西汉时，为对外抗御匈奴骚扰，加强边塞设防，对内安定百姓生活，巩固中央集权，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加强同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和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从秦长城的终点即甘肃临洮开始，向西设亭障至盐泽（新疆罗布泊），并修筑长城，经河西走廊张掖、额济纳旗、金塔、玉门、安西等地，直到敦煌西湖的马迷兔附近。当时的长城叫“塞”或“塞垣”。至今在酒泉市金塔、玉门、瓜州和敦煌等地，还可见到汉长城的遗迹，玉门关以西当谷燧一带的汉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明长城则从张掖市高台境内延伸至酒泉，东西穿越金塔、肃州两县区后，抵达明长城的终点嘉峪关。

酒泉汉明长城气势雄壮，蜿蜒起伏，犹如巨龙一样横贯境内，守卫着昔日的边疆要塞。长城构筑形式多样，因地制宜，体现了浓郁的西部特色。沿线保存着大量的城障、关堡及烽燧等。一些地段由于人迹罕至，受人为破坏因素很少，长城保存相对较好。在长城沿线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敦煌汉简、花海汉简等，以及在汉代用于燃放烽火的军事守御物资“苜蓿”，这些都为研究我国古代酒泉乃至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八、远古化石独放异彩

酒泉境内地质地层发育良好，蕴藏着丰富的恐龙及其他古生物化石，部分化石层位与闻名世界的辽西热河生物群的层位相当。酒泉境内的古生物化石很早就被中外科学家和探险家发现。从19世纪末起，国内外的探险家和考察队开始涉足酒泉境内的马鬃山地区。1893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第二次赴中亚考察中，途经黑戈壁与马鬃山地区，发现了包括恐龙在内的各类爬行动物以及其他脊椎动物化石等。20世纪2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酒泉盆地发现了一些脊椎动物化石。20世纪80年代，在祁连山雪峰之下的昌马地区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我国第一个中生代鸟类化石，后被正式定名为“玉门甘肃鸟”。此外，在酒泉境内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中生代脊椎动物化石，而无脊椎动物和植物化石更是极其丰富。

酒泉境内也是著名的热河生物群分布的西部边缘。热河生物群是分布在广大的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北方、蒙古、朝鲜和外贝加尔地区等）早白垩纪中晚期（距今约 1.25 亿—1.2 亿年）一个古老的淡水湖相动物群。酒泉地区相当于热河生物群的地层分布相当广泛，地层连续，距今约 1.1 亿—1.2 亿年前。这一时期，酒泉地区主要为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植被繁茂，湖泊密布，以恐龙为代表的各种古代生物在这里繁衍栖息。形成于早白垩纪的这些地层，主要由河流和湖泊沉积组成，具有良好的赋存化石的基本条件。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发现早白垩纪的化石地点开始，酒泉地区陆续有化石发现的报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科院古脊椎所等中外科研部门学者相继在酒泉马鬃山地区考察和发掘，发现大量恐龙以及哺乳动物化石等多种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包括：恐龙类的张骞丝路龙、马鬃山原巴克龙、马鬃山鹦鹉嘴龙、康熙桥湾龙、角龙类的大岛氏古角龙，以及属于懒龙类的布林氏南雄龙和似鸟龙类等；龟鳖类的北山龟、黑山泥龟、中国龟、玉门龟等；鳄类的桥湾鳄；鱼类的昌马鱼、沈家湾鱼、旱峡鱼、腔脊鱼等；哺乳类的戈壁尖齿兽、北山三列齿兽、犀牛、羊、鹿等；鸟类的玉门甘肃鸟。此外，还发现很多鸟类羽毛化石，可以归属于数个不同的类别；其他无脊椎动物如腕足类、双壳类；各类植物化石等。

这些化石材料，对研究酒泉境内生物群各门类的进化，生物群的起源与辐射，地层时代的对比，以及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古生态的发展和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化石的研究和保护，对酒泉市文博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是极为有益的补充。

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酒泉大地上，沉淀和保存了各时代、各民族的诸多精美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智慧创造的结晶，更是了解酒泉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民俗发展的一部鲜活的教科书。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全市有不可移动文物点 1393 处，其中新发现 516 处。按类别分，古遗址 878 处，古墓葬 297 处，古建筑 43 处，石窟石刻 50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建筑物 119 处，其他 6 处。有世界文化遗产 2 处（莫高窟、境内长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5 处。境内长城总长 823.5 公里，其中汉长城 742.9 公里，位居全省第一。

全市有各类博物馆和纪念馆 11 所，其中国有博物馆、纪念馆 9 所，民营博物馆 2 所。全市馆藏文物 2.8 万多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1688 件，其中一级文物 174 件，二级文物 492 件，三级文物 1022 件。

为了系统和全面展示酒泉境内的馆藏历史文物，使更多人了解酒泉数千年文明发展的脉络和成就，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从全市馆藏三级以上珍贵文物中精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244 件，以图文形式编辑成册，供历史文物爱好者参阅学习。

目 录

	陶器	(001)
	简牍、文书	(067)
	铜器	(093)
	石、玉器	(145)
	画像砖	(167)
	造像	(197)
	碑刻	(213)
	其它	(227)

陶 器



新石器时代夹砂靴形陶罐

陶器是指以黏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坯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陶器按质地可区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陶器的品种主要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表现内容多种多样，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陶器是人类的重大发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物器，是人类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见证。陶器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离开水源较远的地方去定居和发展，从而扩大了人类生产生活的范围。

考古证明，大约1万多年前，由于定居生活烧煮食物的需要，人类开始尝试生产陶器。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汲水、盛水、贮藏、烹饪、炊饮等作用；同时，在生产活动中，陶土还被烧制成纺轮、弹丸、乐器（如陶埙）等。陶器的发明，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一直发展沿用至今。陶制器物的使用，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标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陶器生产之初，人类并没有刻意地去装饰纹饰，但在加工制作过程中，陶器表面往往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痕迹。随着人们审美观意识的增强，早期的人们逐渐将这些不规则的印痕转变为有意的、规则的纹饰，如成排的剔刺纹、圈纹等。在其后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精心构思和制作，开始利用天然矿物质颜料在陶器表面施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和颜色，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使陶器在实用的基础上，又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彩陶艺术随之诞生。

在中国各地的彩陶文化中，甘肃彩陶独树一帜，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明珠。首先，时代最早。大约距今8000年前后，在今天的天水秦安大地湾诞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批彩陶。其次，成就辉煌。马家窑文化将史前彩陶文化推至巅峰阶段，在甘青地区形成了中国彩陶文化的鼎盛阶段。再

次，延续时间最长。甘肃彩陶绵延发展了 5000 多年（距今约 8000 年至 2000 年左右），是各地彩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最后，文化面貌最为复杂。在甘肃新石器、青铜时代的文化中，大部分文化都含有彩陶，但风格多样，各不相同，既有来自东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来自西方中亚文化的元素。

在酒泉众多史前遗址中，如玉门火烧沟遗址、肃州区干骨崖遗址、西河滩遗址等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彩陶器物，这些器物基本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类型，制作精细，造型别致，风格粗犷，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中不少属于珍品。出土于玉门火烧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质地为细泥红色彩陶。长方形直口、方唇、直壁、平底，四个方棱形平底足。口沿上覆盖有与鼎口大小相同的长方形直口、方唇直壁、平顶盖。别致的是在顶盖上塑制有三个立犬。犬的四肢直立，昂头翘尾，姿态生动而逼真，并在器表施红彩。整个器物造型奇特，制作工艺精细，显示出了原始人类高超的陶艺制作水平和审美水准，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在国内出土彩陶中所罕见。

从汉武帝在河西建立四郡至魏晋时期，酒泉地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酒泉一带由于远离中原战火的侵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相对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厚葬之风开始盛行。人们在观念中向往死后仍然能享受到与人间一样的生活质量，于是，大量的陶制随葬器物开始出现。出现于西汉中期、盛行于东汉的釉陶器，也在酒泉有不少发现。迄今在酒泉地区出土的随葬陶制冥器，器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一切。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盼望着死后仍会像生前那样在另外一个世界度日，所以尽量把生前生活所需的東西，乃至生前的生活场景，在墓中得以重现，包括陶碗、陶甑、陶盘、陶灶、陶瓶、陶釜、陶井、陶尊等等。甚至与人们居家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些动物，如牛、羊、鸡等，也被制作成陶器陪葬于墓中。这些生活类器物，基本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状态，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现实生活写照。